

《文以載道——奈達對聖經翻譯的貢獻》

蔡麗貞

中華福音神學院
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

近代語言學與聖經翻譯理論的發展史

本書是美國聖經公會為紀念奈達對聖經翻譯的貢獻，從奈達的一生勾勒出近代語言學與聖經翻譯理論的發展史。奈達從1943至1980年退休為止，都為美國聖經公會工作，足跡遍及美洲、歐洲、非洲、亞洲，一年有大半時間風塵僕僕地在各地奔波，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支聖經翻譯顧問團隊。奈達所倡導的「動態相符」（dynamic equivalence）翻譯理論，對近代基督教會的宣教工作影響深遠。他也是語言學、宣教人類學、辭典編纂學等領域的專家，多年來獲得不少國家的大學頒發的榮譽學位與學會所嘉許的殊榮。作者斯泰恩曾經是聯合聖經公會資深同工，亦曾與奈達共事多年；譯者黃錫木任職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，同樣與奈達有不少事工接觸與學術切磋，由他們兩位執筆與翻譯，應該是最適合的人選。

奈達在1960年代出版兩本重量級的書籍：《翻譯科學探索》（*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*, 1964），以及與泰伯（Charles R. Taber）合著的《翻譯理論與實踐》（*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*, 1969）。奈達

的翻譯原則不限於聖經翻譯，能適用於任何翻譯。不過奈達認為，在好多方面，沒有任何翻譯能超越聖經翻譯，包括翻譯歷史悠久、語種繁多、文化多元、抄本證據豐富、翻譯人數眾多、翻譯經驗與原則雄厚，等等（頁282-3）。

在《翻譯理論與實踐》中，奈達指出三個相關理論：第一，任何語言都有其特徵。好的翻譯必須尊重各種語言的特質；第二，如果能夠用一種語言表達，就能用另一種語言表達。這與派克（Kenneth L. Pike）所說「神能說萬國的方言」不謀而合；第三，聖經語言沒有任何神聖之處，它跟其他語言一樣，都受到限制。亦即，翻譯無法十全十美地複製，在傳遞意思時，難免有改變意思的危險。

「動態相符」的翻譯理論

在《翻譯科學探索》中，奈達介紹一種翻譯方法，即「動態相符」理論（之後在1986年出版的書籍中將此理論加以改進，稱為「功能相符」【functional equivalence】），是對應於另一種翻譯方法「形式相符」（form equivalence）。後者講求忠於原文的字面翻譯，視聖經原文為不可侵犯的神聖記號，前者則講求靈活、貼切、自然、明白易懂。1970年以前，英國聖經公會（及海外聖經公會）拒絕使用美國聖經公會所標榜的「動態相符」原則，這顯示出雙方在「忠實」或「務實」的原則上有不同的堅持。1966年美國聖經公會出版的《給現代人的佳音》（Good News for Modern Man）就是根據「動態相符」原則的成品，在以英文為母語或第二語言的地區都廣受歡迎，證實「動態相符」原則不但明白易懂，且能忠實地傳達聖經原文的意思。時代風氣逐漸轉移，1970年以後，聖經公會開始只出版由母語翻譯員所翻譯的譯本，宣教士只從旁協助，不再主導聖經翻譯事工，因為只有母語翻譯員才能充分掌握「動態相符」的靈活性。

奈達指出，沒有任何翻譯可以做到與來源語完全相符，譯文總會漏掉一些信息，或增添、扭曲一些意思，即使兩種語言是屬於同一種文化（頁63）。有時字面直譯不僅做不到更忠實，反而會扭曲語言的真貌與文的意義。「只要本土的雙語人士認為那是對源語文本最貼切和『自然』的相符表達，就是好的翻譯。」（頁61）奈達與泰伯進而提出這套「功能相符」方法的三個步驟：第一是分析，將語源文本的表層結構拆成不同的語法關係，以及較小的意義單位；第二是轉換，將前者的資料轉換成受眾語言；第三是重構，將這些資料再組合，成為最終文本，使譯入語的受眾感覺自然流暢，容易接受（頁71）。為了推廣「動態相符」的翻譯法，奈達鼓勵譯入語的當地教會群體參與並主導聖經翻譯的工作，這樣才能譯出流暢自然的譯本，而且出版後，當地群體較容易接受並使用新的譯本。

為了分析語詞的含義，奈達借助於一種稱為「語意的成分分析」（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）的方法，就是將語詞的「必要而充分」（necessary and sufficient）的語意特徵列出，用來鑑定近義詞在意義上的差別。翻譯者根據語意成分分析法，把文本分成一個個意義單位，再把這些單位轉換成受眾的語言。書評者的道學碩士論文（1979年）就是採用奈達的「語意的成分分析」，來分析聖經中有關靈、魂、體的問題，特別是靈與魂的區別。筆者的實驗結果是：兩者在很多場合是同義字，有許多重疊的意義，但又不恆等，這也證實一個普遍原則：就是沒有兩個字是完全相同的意義，既然使用不同的字表達，則必有不同意義的時候。有關人的二元論或三元論曾是聖經學者與神學家爭議性的問題，而這種客觀又細緻的「語意的成分分析」所導出的結論，讓不同神學觀點的人都欣然接受。

本書非一般的人物傳記，重點是放在奈達與聖經翻譯工作的發展之始末。如作者不斷稱許的，與奈達共事過的同僚都見識過他的溝通、協調長才，以及化繁為簡的本事。一方面精通許多學科；一方面又兼容並蓄，善於整合、貫通。奈達是福音派背景，又能與所有人同工，以至於能帶領

團隊越過重重障礙，與意見相左的團體達成合作事工。書中有不少關於奈達為人處世的溫馨記錄，包括他與大師級的語言學者如派克、喬姆斯基（Noam Chomsky）、經文鑑別學家梅茨格（Bruce Metzger）、格林利（Harold Greenlee）及各地聖經翻譯學者的切磋、互動，還有奈達如何提拔、使用聖經翻譯的人才，他在協助各地翻譯人員所遭遇的難題，其間穿插有趣的文化故事，以及需要靈活應變調整的翻譯個案。

聖經翻譯難題案例

有幾個聖經翻譯難題饒有趣味，如「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」（羅十二20，頁58）、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」（羅八28，頁135），相信可以糾正許多讀者錯誤的習慣解釋。有些聖經經文易使人誤解，如「上帝的義顯明出來，這義是本於信，以至於信」（羅一17），爲了凸顯「上帝的義」此片語是指上帝使人與祂有合宜的關係，《現代英文譯本》譯爲「因爲這福音啓示上帝使人跟祂有合宜的關係：是起於信，止於信」。（頁176）另外兩個例子是針對保守派觀點而調整譯文的例子：「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」（賽七14）的「童女」以及「只是分別善惡的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」（創二17）的「吃的日子」，奈達堅持忠於舊約上下文脈與原文的表達（頁178-180），對很多福音派讀者而言是極大的震撼！難怪作者不諱言，聖經公會有時被冠以「自由派」的神學。

由於作者是聯合聖經公會資深同工，他刻意介紹聖經公會的宗旨與特色，如服事普世教會，絕不在尙未有教會的地方支持翻譯事工；盡量反映主流的學術成果，不偏向某個宗派；又要維持嚴謹的學術水準，也因此有足夠信譽吸引出色學者一起合作；聖經不加註解，避免試圖協調不同書卷的矛盾。（頁175，183，193）其中有關內部作業的流程以及政策改變的過程，包括幾次與外界（如羅馬天主教、東正教及中國大陸）重大突破的接

觸與合作（第七章），在在揭露聖經公會這個國際專業團隊的神秘面紗，有助於拉近聖經公會與教會信徒的距離，也有助於延攬更多各地的專業人才加入這個團隊。

聖經公會服事普世教會的宗旨，不容易討好所有宗派，與天主教合作的聖經譯本涉及《次經》（備典）的問題，引起新教團體的不安，有些宗派甚至撤回經費奉獻，或拒絕聖經公會出版的聖經。加上奈達開創先河的洞見與翻譯原則，需要假以時日才能形成風氣。本書偶而揭露一些不同意奈達的論調（如van Leeuwen 批評「動態相符」的譯本過於迎合讀者的期待，反而失去聽見上帝「他者」的聲音，頁292），而作者始終明顯地支持奈達的觀點，並為之辯駁，使讀者對奈達的為人與工作有幾近完美無缺的英雄形象，這或許是本書在平衡性的報導上一個微小的瑕疵。

遷就聖經作者或讀者？

本書在接近尾聲時（第九章），以歷史宏觀的角度將翻譯學分成三個模式：耶柔米模式（以某種特別的相符概念為核心）、賀拉斯模式（Horace Model，遷就讀者的模式）以及施萊爾馬赫模式（Schleiermacher Model，遷就原作者的模式）。本書作者認為奈達與馬丁路德是屬於第二種模式（頁267，270），但書評者認為兩人應該是第二與第三種模式的綜合。因為路德認為：譯經的首要原則是提供給德國人一個清楚的意義，若能用德文傳達給德國讀者，就不應該用希伯來的風格表達方式；但是有關神學教義方面的經文，神學解釋比文字通暢重要，因此德文應屈就聖經原文。正如奈達主張：譯者應儘可能使譯文讀起來自然流暢；但同時也不能丟掉忠實以及最貼切和相符的表達。作者承認歷史中不乏優秀的聖經翻譯者如路德，但是卻沒有人建立一套理論基礎與龐大的國際團隊，而這應該就是奈達獨特的貢獻吧！

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，將直接讀聖經的特權釋放給所有信眾；這兩百年經過聖經公會的努力，使得世界許多族群的信徒可以用其方言閱讀聖經。不但如此，由聯合聖經公會所出版的《希臘文新約聖經》（UBSGNT）以及所彙集的舊約聖經的經文鑑別六千多個難題叢書，是今天從事聖經翻譯者必須依循的參考，而奈達都是幕後推動的功臣。

這是對聖經翻譯及語言學有興趣的人值得讀的好書。

